

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 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

□王日根

过去一向认为:宋代以来,家族制度随着中原移民被带入福建,即福建的家族源于中原。可笔者在翻检有关清代前期福建基层社会管理的史料时,却觉得家族发展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地位,在家族组织之外,还有其它类型的社会管理组织,这表明家族发展除了与中原文化传统有关外,更与当时福建各不同地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连。

—

闽北是北方移民移入福建的第一站,进入福建的移民往往首先便在人口稀疏的闽北地区落下脚来,并开始依山垦田,延续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

由于闽北地处山地丘陵,“四乡之田依山者多,平地者少,民所耕之田与所居之处相隔数十里而遥,耕时朝出暮归,蓐草亦如之”。^①这种分散化的农业生产,只能是小规模的居民村落;又因为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人们在地方的社会地位亦时有变化,如崇安县:“本邑氏族,……沧海桑田,变迁颇烈,盛于昔者衰于今,盛于此者衰于彼,不可一概而论也。柳盛于宋,钱盛于清,而今无其人。曹墩以曹姓得名,萧屯以萧姓得名,哀墩哀岭后以哀姓得名,而今无其族。清初城村林、道二姓几二千户,今仅二百余户,咸同时各村均有人满之患,今则寥若晨星。……观乎此,则各族消长之机、盛衰之况,可以知其概矣”。^②农作经营既依赖于土地,同时势必受到人丁、气候、生产资料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势必是难以避免的。

在农业经营方式影响下,又较易形成乐天安命

的易满足感。在崇安:“本县土质肥沃,气候温和……农产较富,从事耕作之农民 14440 户……生活易于解决,每年除种稻外,他种作物极少栽培”^③。因此,直到明清时期,当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商品性农业不断发展,社会分工渐趋扩大的时候,闽北山区的粮食竟能大量外运。在崇安直到民国初“本县民智未开,生产落后,揆其数皆不知注重职业故也,茶叶经营均操于下府(沿海各州县)、广州、潮州三帮之手……本地人几无一业此者”。较早受到商品经济影响的福建沿海及广东人来到闽北地区时,闽北依然维持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方式,民风依然敦朴。

在自给自足、较少生存竞争意识的情况下,闽北地区较长期地保持着杂姓聚居、家族组织松散的状况,这使得来自各地的姓氏与原有居民都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彼此的兴衰并不与先来与后到有直接的关系,因而,他们之间反而更容易保持一种比较和睦的乡邻关系,以共同谋求基层社会的平衡与稳定。因此,维系这一带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力量除了政府的行政组织之外,神灵的信仰与祭祀是一种重要的整合纽带。

且看崇安的辟支古佛崇拜,就较具典型意义。辟支古佛又号扣冰和尚,俗名翁藻光,崇安吴屯里人,出身世家,祖父翁巨隅、叔父翁承赞、父亲翁承钦都先后任官,且对福建的开发及闽国的政治多有建树^④。但翁藻光却生来性喜清静,十三岁时就出家当了和尚,八十四岁寿终。据当地人传说翁藻光圆寂之后屡显灵异,特别具有消灾驱寇调和雨暘之功能^⑤,这与当地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恰相吻合,信仰生于

需要。

由于辟支古佛被传说得日具灵响,其祭祀活动便多能一呼而百应,不仅同村各姓踊跃从事,而且邻近村庄(特别是那些没有寺庙的村落)亦纷纷来此祈拜,庙寺的建造者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他们甚至以此引为荣耀。

这种局面的维持是奠基于社会经济相对稳定、贫富分化不甚悬殊、阶级的划分亦不显著的基础之上的。在崇安的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份的。掌管辟支古佛庙的人称为“会首”,担任会首是本村居民所共同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会首的确定是在每年农历2月佛诞祭典结束之后举行的,如官埠头村,1949年以前共有20余户人家,从村头到村尾,以户为单位,每四户人家共同轮值一年,各年的轮值会首负责这一年的寺庙财产管理,操办第二年2月的祭典,祭典结束后,把会首的取资以及寺庙的财物钥锁交给下一轮会首的四户人家,如此周而复始,沿袭不绝。

会首的轮值并不因人口迁入与迁出而受到影响,如果当值者迁出,则由下一户人家预补充继,如果有新迁入者,一般都自觉地加入轮值之行列,因而保持了一种开放的情怀,使这一地域社会在变动中保持平衡。

必须指出,这种平衡的维持有赖于属于行政系统的保甲之长的佐助。保甲之长产生于本乡本土,亦无甚多财富,故往往成为村民与上级政府相互沟通的中介人和村里公共事务的主持人。村镇派捐少量的钱财物力,需要会首们与本村的甲长出面设计协调,而村庙举行祭典和轮值会首的确定与交换,甲长也就成了当然的见证人,保甲长们的参与体现了闽北山区乡族组织尚不能成为地方社会自我控制的领导力量,换言之,保甲长们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地位的确是乡族组织不发达的直接体现。

辟支古佛的祀典仪式是实现基层社会不同族姓之间的整合的可行的和有效的途径,居民们对于辟支古佛崇拜比较平等的参与培养了自己的社区认同意识,人们宁愿放弃过去的乡土神祇,因为在辟支古佛的信仰体系中,体现了较强烈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无意于去营造保护自己利益的乡土神祇,而融入辟支古佛崇拜之中。

在崇安城镇的辟支古佛崇拜,轮值会首由保甲中选出,其中地方士绅、殷商大户更便于充任这样的角色,这也反映了政府力量在其中具有较明显的影响。城镇辟支古佛崇拜通过举行腊烛会,行香斋之施,来汇聚信徒,以求得消灾驱邪,预祝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同样反映了农业社会的文化追求。

在腊烛会期间有辟支古佛像的迎奉巡游活动,同会首的轮值一样,其巡游路线亦是按照城镇的行政图甲(保甲)挨图挨甲进行的,所谓“轮图接收,名为常承”,其注重协调社区间关系的用意显然可见。在巡游期间,人们争相祈神拜佛,以致逐渐变出“抢佛”之俗,但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和敦朴民风的影响,抢佛并没有酿成械斗之争,而是沿着和平竞争的轨道运行,抢佛活动不仅坚定了人们对辟支古佛的虔信,而且也通过相互的接触与竞赛加强了沟通与联络,特别是随辟支古佛祭祀也腊烛会而进行的墟市活动更把这种交流与联络向前推进。除了当地木、竹等土特产品外,还有四方商贾贩运而来的南北物产、日用百货。这种活动成为崇安人民农贸、备耕、生活必需品交流和集贸活动,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安定发展。

在闽西,宗族的散居现象也较为明显,这是农业经营方式之下的必然产物。其后,闽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这既因为人丁的繁滋,也因为山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为该区人民的生计提供了很大的保障,如造纸、林业、菁业等蓬勃兴起为人们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有些人干脆走出乡土,移居外地,或把家乡的耕作技术传至客地,或在移居地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如闽西移民四川,在四川发展起钮扣业、糖业,种植甘蔗、番薯等,这些都是商业性活动。宗族的连宗现象有所抬头,一些在外地经商致富的人们投资于壮大家族的活动,推进了闽西家族的兴盛,更加上清初政府颁布了鼓励家族发展的政策,而这类政策是在江南士大夫阶层的积极倡导下被政府采纳并行之于社会的。在闽西形成了以神灵为纽带的家族群体,他们通过祭神、娱神等活动显示自己在乡里的地位,也建立起自己的荣誉感;同时在闽西也因为频繁的

土匪活动与佃农的反抗斗争为整合宗族提出了要求。正因为这些原因,使得闽西的社会基层整合组织背离了闽北模式而较接近于闽东南模式。

二

闽东南宗族聚居的色彩较为浓厚,这不仅与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有关,而且与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还与频繁的自然灾害与纷乱的社会环境有关。关于商品经济发展对宗族发展的影响,过去已多有论述,如有的家族出现了族工、族商的现象,形成了集团力量,有的家族内部成员实现了职业多元化,从而增强了对社会变迁的适应力。

在闽县外七里区,“村民多以烧陶、伐石为业。塘屿村三百家,皆业石工。黄石村六百家则业陶瓷,出产以灯心草为大宗”^⑧,呈现出专业化倾向。在侯官县河堤“赵姓千余户,业耕织及商,泽苗“张姓千余户,习农商,乡多产桔”^⑨,陈厝“居民陈姓约九百余户,习四民业,土产桔、李等物”,大文山“约六、七百户,皆陈姓,田地无多,均习烧瓦,计有瓦窑十八所”,甘蔗“土著三千余户,程为大姓,间有张、邹、林、郑各姓,有业儒者,有习田者,有牵牛服贾者,……夹洲多植橄榄,桑、蔗,颇称富庶”^⑩。

明前期闽东南沿海的祠堂大多是由士绅阶层倡建的,士绅阶层在这一带历来发达,宗族的凝聚以“敬宗收族”为旗帜,依靠士绅们的经济实力,借助宗族的纽带,有效地执行着整合基层社会的作用。

明嘉靖以后,倭寇日炽,许多宗族遭蒙其劫,这从外部对宗族的凝聚提出了新的要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漳属土堡,旧时尚少,嘉靖辛酉(四十年,1561)以来,民间围筑土城、土楼日众,沿海地方尤多”^⑪。在泉州府属地方,民间私设的城堡大多称“寨”。“泉郡东南濒海,接迹岛夷,晋、南、同、惠诸邑筑寨,皆为备倭……嘉靖末年,倭寇充斥,村落之民多以寨坚人强得免”^⑫。

在闽东地区,筑堡之风亦颇盛行,乾隆《福宁府志》说:“嘉靖乙卯(三十四年,1555),倭自浙入闽,蹂躏遍州境……于是南若河蛤、竹屿、南屏,西若厚首、清皓,东若七都、三沙,北若柘洋之西林,凡沿海要区,竟起而兴城堡者无虑二十处”。

本用于御倭的乡族武装后来渐渐演化为乡族间械斗的依恃,这使得地方社会矛盾日显激化,在倭寇之乱平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乡族间的矛盾与对峙竟长期存在,于是大族凌小族的现象日显严重,人们对宗族的凝聚意识较为强烈。但明清战争,清初的迁界政策都给沿海宗族的发展以强烈的打击。

外界的激烈变故更加强了人们对宗族的依赖,士绅阶层依靠政治特权首先举起重建宗族的大旗,如晋江陈埭丁氏《列祖神主入大宗祠合祭祝文》记言:“大宗祠自午亭公重建,康熙乙丑(十四年,1675)倾损不可复睹,雁小公捐清俸百金,倡族人重新,完其中堂”^⑬。午亭公“为明朝族绅丁日近,官至户部主事”,他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重建了嘉靖年间被倭寇焚毁的祠堂,强化了丁氏宗族组织^⑭。

陈盛韶记道光年间“仙游小姓畏大姓甚于畏官。其畏之者何?一朝之忿,呼者四应,直有剑及寝门,车及蒲胥之势”^⑮。在此情况下各姓皆以族大丁多争雄,有的小姓为了对抗大姓,也组成了“合众姓为一姓”的拟制宗族,如“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以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者”^⑯。在乡族械斗较为频繁和激烈的地区,就连大姓之间也有类似的同姓组织。如同安县“雍正六年(1728),包、齐会聚众格斗,大姓李、陈、庄、林为包,杂姓为齐”^⑰,互有杀伤。平和县一带地方“崇祯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以万为姓”^⑱。乡绅阶层也积极参与此类活动。如漳浦县旧镇一带,原有陈、张、钟、吴四姓混居,“相亲相爱,有逾骨肉”。至乾隆五年(1740)“翰林检讨张公光跻等共奉圣母,以庙为祖,鸠集父老,分为四房,序以昭穆,城旷典也。”民国十三年(1924)《重修天后庙序》中说:“比邻之间同姓既可为兄弟,则异姓亦可同祖庙”^⑲。宗族与拟制的宗族组织成为当地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组织模式。

合户现象中亦多有虚拟成份。道光年间,诏安数姓合立一户,如李、林等户合为“关世贤”,叶、赵等户合为“赵建兴”是也^⑳。同姓连宗的现象也颇普遍,安溪县缙绅官献瑶甚至与福州上官氏联系,虚拟的成份是显而易见的。

东山岛为明代的卫所,其居民主要为军户的后

裔,清初迁界后,卫所废置,军籍也随之取消,康熙四十年(1701),始于东山岛编立里甲户籍,而军户的后裔因无宗可归,难免“傍人门户”,乃联合设立共同的户籍。因此,所谓“关永茂”户,实为东山岛军户家族的联合组织,其派下四、六、七诸房,分别为一姓所据,可能各代表一族,而一、三、五诸房则又分别包含若干不同的家族,这种异姓合户的现象表明当时的里甲组织也已家族化了。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看法:

(一)各种不同的基层社会整合组织都有神灵作为精神纽带,尽管这些神灵崇拜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地区间的整合经常必须借助于神庙的凝聚。有了共同的祭神场所,商业贸易等经济交流才得以实现,因而,社会整合的纽带往往并不是先定的,它经常会适应形势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较能适应社会变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的就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在闽西,商人们出资兴办民间文化活动,本质上包含了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功利目的与进行社会整合的内涵,在闽东沿海,自然灾害的影响使人们组织起“社”或“境”等组织^⑨。地缘的因素在其中有重要作用。

(二)移民进入福建后并未马上建设家族,这表明这些家族并不一定是中原家族的迁建,而是移民在移入新居地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建立的自我管理组织形式。

(三)建设家族有不同的目标要求,有的是官宦们显示自己孝义的体现,有的是为了开拓农工商业的生活空间,也有的是则是主要着眼于增强自己集团的防御能力。在官宦们建立的家族中,族众的依附性较强,在为了开拓农工商业的生活空间时,宗族的表现形式是血缘性的或联合性的,在为了防御的宗族那里,宗族的拟制现象就更为普遍。

(四)家族的兴盛与福建移民的大规模举族迁徙密切相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基础,才有了家族重建的可能,但这决不是说家族就必然会重建,他们在首先由闽北进入时,一般并不急于复兴家族,因为彼此保持了较大的开放性,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也基

本运行正常,故而毋需家族内部的自我保护,其后发展起一些富家大族,则多是官宦式的。我们认为,家族的发展并不是社会整合的唯一途径,它也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家族作为社会整合组织自有其复杂的社会生存机理,其中亦有一些合理的成份。

(五)这些各种不同的社会整合组织都有其局限性,因而佃农反抗斗争、宗族间的械斗、不同祭祀团体之间的争斗都时有发生,这既反映了这些社会整合组织的局限性,同时也助长了更多的这类社会整合组织的发展,封建官府有时在民间争斗面前束手无策,有时却接受贿赂,处理不公,反而更助长了民间的争讼风气。^⑩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注释:

- ①康熙《崇安县志》卷一《地理》。
- ②民国《崇安县新志》卷四《氏族》。
- ③康熙《崇安县志》卷十四《农业》。
- ④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二十三《宦绩》。
- ⑤同治《古佛全传》卷上,翁昭泰编,第26—27页。
- ⑥⑦《闽县乡土志·地形略》。
- ⑧《侯官县乡土志》卷六《地形略》。
- ⑨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三《福建三·漳州府》;卷九十五《福建五·泉州府》。
- ⑪《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1980年油印本。
- ⑫郑振满《明代陈江丁氏回族的宗族组织与汉化过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版)1990年第2期。
- ⑬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县·竹簾》。
- ⑭庄吉发《清代天地会起源考》转引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⑮民国《同安县志》卷三十《大事记》。
- ⑯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六。
- ⑰《重建天后庙序》(碑刻)。
- ⑱陈盛韶《问俗录》卷四《诏安县·花户籍》。
- ⑲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⑳拙作《明清时期福建的民间械斗与封建官府》,《福建史志》1996年第5期。